

萨特文集

I

厌恶

秦天 玲子 编

目 录

厌恶	1
墙	240
卧房	265
艾罗斯特拉特	296
闺房秘事	315

厌 恶

献 给
海 狸 1

他是一个没有集体重要性的小伙子，
他仅仅是一个人而已。

——路易·费迪南·舍连那^①《教会》

^① 路易·费迪南·舍连那(L. F. Celine)，法国当代反动作家，生于一八九四年，是一个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者，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维希分子；希特勒德国战败后逃亡丹麦，曾被逮捕和判处徒刑，后被释放，于一九五一年回法。

编 者 序 言

这些日记是在安东纳·洛根丁的文件里发现的。我们加以发表，不作任何改动。

第一页没有注明日期，可是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一页的写作日期比正式日记的开始早几个星期。因此，这一页最晚总是在一九三二年正月初旬写的。

在这一段时期中，安东纳·洛根丁从中欧、北非和远东旅行回来，在布城^①定居了三年，想在那里完成他的关于德·洛勒旁侯爵^②的历史资料的研究工作。

编 者

① 布城 (Bouville)，作者虚构的地名。

② 德·洛勒旁侯爵 (Le marquis de Rollebon)，在历史上查无其人。

没有注明日期的一页

最好是把发生的事件逐日记下来。写一本日记以便把记下来的事情看个清楚。不放过微妙的变化，不放过那些即使从外表上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情，尤其要把它们分类。应该说，我怎样看见这张桌子、这条街、这些人、我的烟袋，因为发生过变化的正是这一切。应该精确地确定这种变化的范围和性质。

举个例子来说，这只纸盒装着我的墨水瓶，我应该设法说出以前我是怎样看见它的，现在我^①。这样说吧：它是一个直角的平行六面体，它突出于——真蠢，关于它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正是应该避免的事：不应该把平常的东西说得稀奇古怪。我认为写日记的危险就在这里：人们对一切都夸张，而且随时都在戒备着，又继续不断地歪曲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我能够随时随刻恢复前天的印象，而且恰好是关于这只纸盒或者任何别的物件的印象。我应该经常准备着，否则这个印象仍然会从我的手指间溜走。不应该^②。应该把发生的一切细心地记下来，而且记得十分详尽。

当然，我再也不能够把星期六和前天的事情写清楚了，因为这些事情离开我已经太远；我所能够说的，就是在这两天中，

① 这里的地位是空白的。——原注

② 这里涂掉一个词儿（也许是“forcer”“夸张”或者“forger”“捏造”），另加上一个词儿字迹模糊，看不清楚。——原注

没有发生过通常可以称为“事件”的事。星期六，有些顽童在打水漂^①，我也想学他们的样，把石块投到海面上去。正在这时候，我停了下来，我让石块落下去，然后我走了。我的样子一定象个神经错乱的人，因为顽童们在背后笑我。

以上是表面发生的事。在我内心发生的一切并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我看见了一件东西而且感到厌恶，可是我再也不知道我看的是海还是那块石头。那块石头是扁平的，一面干，另一面湿，而且沾满污泥。我捏住它的边沿，手指四面撑开，以免弄污我的手。

前天，那就更加复杂了。也发生过一连串我所不能理解的巧合的事，阴差阳错的事。可是我不高兴把这一切都写在纸上。总之，可以肯定的是我害怕，或者我有类似害怕的感觉。假如我仅仅能够知道我害怕的是什么，我就早已前进一大步了。

奇怪的是：我毫不准备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疯子，我甚至明显地看出来我并不是，因为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事物的变化。最起码我希望能够肯定这一点。

十时半^②。

不过，也许我的确曾经有过一点儿神经错乱。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上星期我所有的那些古怪的感觉，今天我看来觉得十分可笑，我再也不会有这些感觉了。今天晚上我觉得舒适自在，象个有产者那样活在世界上。这儿是我的房间，面朝东北。下面是残废街和新火车站的建筑工地。我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维克多-诺瓦林荫道转角上铁路饭店的又红又白的灯

① 向水中投石，使石块在水面滑行的一种游戏。

② 显然是晚间十时半。这一段日记比前一段在时间上晚得多。我们相信这一段最早也是在第二天写的。——原注

光。巴黎开来的火车刚到站。旅客们从旧火车站走出来，分散到各条街道上。我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许多人在等候末班电车。他们恰好在我的窗户下面，那根煤气路灯柱子的周围，一定是一小群凄凄凉凉的人。他们还要等待好几分钟，因为电车要在十时三刻才经过这里。但愿今天晚上没有行商到达，因为我多么想睡而又好几晚没有睡够。很好地睡一夜，只要一夜，所有那些感觉就会一扫而光。

十时三刻。再也不必担心了，要来，他们早已到达了。除非这是德·路恩先生要来的一天。他每周都来，他们给他保留着二楼的二号房间，就是有洗下身盆的那一间。他还可能来，因为他往往在睡觉以前到铁路饭店喝一杯啤酒。不过他也不会弄出很多的声音。他这人十分矮小，十分整洁，有黑色而发亮的胡髭和一头假发。他来了。

当我听见他上楼梯的时候，我的心轻微地动了一动，因为这是十分令人安心的：这个世界这么有规律，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相信我已经痊愈了。

从屠宰场开往大喷水池的七路电车驶来了。它带着很响的铁器相撞声到来。它又开走了。现在它满载着行李和入睡的孩子，向大喷水池驶去，向那些工厂，向黑暗的东区驶去。它是末班前一辆电车，末班电车要再过一个钟头才经过。

我要睡觉了。我的病已经好了，我不必象小姑娘们在新的漂亮簿子上写日记那样，每天把自己的印象写下来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对写日记感到兴趣，那就是假如^①

① 没有注明日期的一页写到这里停止。——原注

日 记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有一种变化在我的身上发生，对这一点我再也不能够怀疑了。它象疾病一样到来，它不象通常事物那样确实地、明显地出现，却是偷偷地、逐渐地安顿下来的；我只觉得有些古怪，有些不自在，如此而已。一旦安顿下来以后，它就不再动了，它安安静静地，使我能够确信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一场虚惊而已。而现在它发展了。

我并不认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需要进行心理分析。在我们的职份里，我们只和那些完整的观念打交道，人们给这些观念取了一些含义较广的名字，如“野心”、“利益”等等。不过，如果我对我自己有丝毫的认识的话，现在就是应该拿这些认识来应用的时候了。

举例来说，在我的手里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我的手用特殊的方式来拿我的烟斗或者叉子。或者是叉子现在要我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拿它，我也弄不清楚。刚才我要走进房间的时候，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里有一件冰冷的东西用它的个性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我把手张开，我望了望：我的手里只不过握着房门的把柄。今天早上，在图书馆里，“自学者”^①过

^① 他是奥义耶·普……，这本日记里经常提到他。他的职业是执达员的书记。洛根丁于一九三〇年在布城图书馆里认识他。——原注

来和我打招呼，我花了十秒钟来认出他。我看见的是一个陌生人的脸，简直不象一个脸。然后是他的手，他的手象一条肥大的白色的虫握在我的手里。我马上把他的手松开，他的臂膀软绵绵地垂下来。

在马路上，也有许多分辨不清的声音在荡漾着。

因此，最近这几个星期发生了一种变化。可是变化在哪儿？这是一种抽象的变化，并不体现在任何具体东西上。难道是我自己变了吗？如果不是我，就应该是这间房间，这座城市，这个宇宙；必须选择一种。

我相信变了的是我，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也是最不愉快的解决办法。不过我应该承认我是会发生这种突然变化的。问题在于我很少思想，于是一大堆微小的变化在我的身上积累起来，我不加以注意，然后有一天，就发生了真正的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在我的一生中有不调和、不统一的现象的原因。举例来说，当我离开法国的时候，有许多人说我是一时冲动才走的。后来我旅行了六年之后，突然回来，人们又很可能说我是一时冲动才回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迈尔西爱在那个法国公务员的办公室里的情形，这个公务员去年受到“彼特路事件”的牵连辞了职。迈尔西爱带着考古学的任务到孟加拉去。我早就想到孟加拉去，他就逼我和他一起去。现在我研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他是不相信博塔尔，想靠我去监视他。我看不出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即使当时我已经预感到这个关于监视博塔尔的小小安排，那就更应该热烈地接受。可是当时我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把电话机旁边一块绿毯子上的一个高棉人的小雕像摆摆好。我觉得我似乎充满了淋巴

液或者温暖的奶液。迈尔西爱带着天使般的耐心和我说话，这个耐心掩盖着一点焦躁。

“您瞧，我需要一个正式的答复。我知道你迟早会答应的，不过最好是马上就接受。”

他有一把赭黑色的胡子，上面洒过不少香水。他的头每动一动，就有一阵香味钻进我的鼻子。然后，突然间，我从六年的酣睡中觉醒过来。

我觉得那个雕像讨厌而且呆笨，我感到深深的厌倦。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在印度支那。我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我和这些人谈话？为什么我的身上穿得这么可笑？我的热情已经完全消失。多年来这份热情淹没了我，冲着我向前走，现在我觉得内心空虚。可是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在我的面前有一个体积庞大而乏味的观念，带着一种冷漠的态度安顿下来。我不十分知道这是什么，可是我不能够正视它，因为它太使我感到恶心。这一切对我说来是和迈尔西爱的胡子的香味混在一起的。

我对他感到极度愤怒，我抖擞精神，冷冷地回答他：

“我感谢你，可是我相信我旅行得够了，现在我必须回到法国去。”

第二天，我就赶上了到马赛去的轮船。

如果我没有弄错，如果这些积累起来的征象是我的生活将发生一个新的大变化的预兆，那么我是害怕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生活很富足，也不是很艰难，更不是很高贵。我害怕的是将要发生的东西，将要控制住我的东西——而且它要把我卷到哪儿去呢？难道我又要出门，又要把我的研究工作、我的书搁下来吗？我会不会在几个月以后，几年以后，筋疲力尽地、绝望地在新的失败中醒过来呢？我很想在时机尚未太晚以前，看

清楚我身上有些什么。

一月三十日星期二。

今日无事可记。

我在图书馆从九点工作到一点。我已经整理好第十二章和关于德·洛勒旁在俄国旅居的全部经过，一直到保尔一世的死亡^①。现在工作已经结束，在重抄一遍以前再也不必动它了。

现在是一点半钟。我在马布里咖啡馆，吃着三明治，一切近乎正常。在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尤其是在马布里咖啡馆里。这是因为咖啡馆的经理法斯盖勒先生的缘故。这位经理的脸上带着一副十分明显和令人放心的流氓神气。不久就是他午睡的时刻，他的眼睛已经发红了，可是他的行动仍然十分活泼和果断。他在餐桌之间走动，悄悄地走到正在用餐的客人身边问道：

“这样好吗，先生？”

我看见他这样活跃就微笑起来，这已经是他的店里将要空的时刻，他的脑子里也快要空了。从两点到四点，咖啡馆里是空无一人的，那时候法斯盖勒先生就要呆头呆脑地走几步，侍者们熄灭了灯火，他就慢慢地入睡了。他在孤独一人的时候，就要打瞌睡。

店里还有近二十个顾客，都是些单身汉、小工程师、职员。他们在寄宿的人家——他们管这些人叫作他们的食堂——匆匆忙忙地吃了午饭，由于他们想有一点奢侈的享受，他们就到这里来，喝一杯饭后咖啡，玩玩骰子；他们弄出一点声音，可是这声音分散零落，对我没有妨碍。他们也一样，要有几个人

^① 保尔一世（1754—1801），法国皇帝；一七九六年篡位，一八一一年被拿破仑皇帝路易十八处决。

在一起才能存在。

我是孤零零地活着，完全孤零零一个人。我永远也不跟任何人谈话；我不收受什么，也不给予什么。“自学者”不算在内。还有铁路饭店的老板娘法兰梭瓦丝也不算。可是我算跟她谈话吗？有时，晚饭以后，她拿啤酒给我，我就问她：

“今晚你有空吗？”

她从来不说没空，我就跟着她到二楼的一间大房间里去；那是她算钟点或者按天出租的房间。我不付钱给她，我们的性爱是互利的交易。她从中得到愉快（她每天需要一个汉子，除了我以外她还有别的汉子），我也能够消除某些烦闷，我对这些烦闷的原因是太熟知了。可是我们很少交谈。交谈又有什么意思？各得其所就够了；而且我在她的眼中首先是她的咖啡馆的一个顾客。她一边脱衣服一边对我说：

“告诉我，您知道有一种叫做‘布里各特’的开胃酒吗？因为在这个星期里有两个客人要过这种酒。侍女不知道，她来通知我。这两个客人是旅客，他们大概是在巴黎喝过这种酒。可是我不愿意在没有知道清楚以前就去买进来。如果您不在乎，我就不脱袜子了”。

过去——甚至在安妮离开我以后很久——我曾经代替安妮思想。现在我再也不代替任何人思想了；我甚至不肯费心去搜寻字句。思想或快或慢地在我身内流过，我一点儿也不使它停留下来，我任其自然逝去。大多数时候，由于缺少字句可以依附，我的思想始终模模糊糊，它们形成一些不明确的、有趣的形体，互相吞噬消失，我马上就把它遗忘了。

这班小伙子使我感到惊异：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讲一些清楚明白的、可能是真实的故事。如果问一问他们昨天干过些什么，他们不会感到困惑，他们会用三言两语把情况告诉你。如

果我是他们，我就会把话说不清楚了。的确，好久以来，再也没有人关心我怎样过日子。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的时候，就会连什么叫做“告诉别人”也不懂了；所谓可能是真实的事情会同朋友们一起消失，对事件也一样，我们让事件消逝；你看见一些人突然出现，他们说了话又走开了；你投身到一些没头没尾的故事里面：你在这一切当中可能当上一个可憎的见证人。可是，作为补偿的是：一切可能不真实的事，一切在咖啡馆里不能使人相信的事，我们却都注意到。举个例子来说，星期六下午四时左右，车站建筑工地由木板铺成的人行道的末端，一个矮小的穿着天蓝色大衣的女人跑着向后退，一边笑一边挥着手帕。与此同时，一个穿着奶油色雨衣、黄皮鞋，戴着一顶绿色帽子的黑人，吹着口哨正好从街角上转过来。那个女人马上就要撞到他的身上，女人始终倒退着走，她的上头有一盏悬挂在栅栏上要到晚上才点着的路灯。因此，在同一时间，这里有发散着强烈的潮湿木材气味的栅栏，有这盏路灯，有这个倒在黑人的怀抱里的矮小的金发女人，上面是火红的天空，我猜想如果我和四、五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可能看见这场相撞，看见所有这些柔和的颜色，那件象鸭绒被似的漂亮的蓝色斗篷，浅色的雨衣，路灯的红色玻璃；我们都会笑这两个人在孩子似的脸上流露出惊愕的神情。

一个单独的人很少产生笑的欲望：整个这一切激起我一种十分强烈甚至野蛮的感觉，可是这种感觉是纯洁的。然后这一切拆散了，只剩下那盏路灯，栅栏和天空，这还相当美。再过一小时，路灯点亮了，风刮起来了，天空昏暗了，一切都消失了。

这一切并不是十分新鲜的东西：这些无害的情绪，我从来没有拒绝过它们，恰恰相反，我欢迎它们。要产生这些情绪，只

要稍为孤独一点就够了，孤独到恰好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摆脱可能是真实的事情就够了。可是我留在人群附近，留在孤寂的表面，决定在紧急时机，逃到他们当中躲避；归根结蒂我到目前为止只是孤独这玩意儿的业余爱好者。

现在，到处都有一些象放在桌子上的那杯啤酒一样的东西。我看见这杯啤酒，我就想说：等一等，我再也不想当孤独者了。我很明白我做得太过份了。我认为一个人是不能够为孤寂“留下位子”的。这并不是说我在睡觉以前要张望一下床底下，也不是说我在半夜里害怕我的房间会突然打开。可是，不管怎样，我感到不安；半个钟头以来我避免望着这杯啤酒。我看上面，看下面，看右面，看左面，我就是不愿意看见它。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所有在我身边的这些单身汉一点也不能帮助我，因为已经太晚了，我再也不能够逃到他们当中躲避了。他们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会对我说：“这杯啤酒怎么样？它跟别的没有什么不同。它是斜角形的，有一只把手，杯身上有一个小盾和一把铲子，在盾上写着德文‘铲牌啤酒’字样。”我知道这一切，可是我还知道有别的东西。差不多看不出的一点东西。不过我再也不能够把我知道的解释出来。不能对任何人解释。我知道的是：我慢慢地滑进水底，向害怕滑去。

我孤零零地在这一片快乐和正常的人声中。所有这些人把他们的时间花在互相解释和庆幸他们的意见相同上。我的天，他们多么看重所有的人意见相同这件事。只要看看他们的样子就够了：有一种人眼睛象鱼，神气仿佛有神经病，这是不可能和别人意见相同的一种人；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在他们前面走过，他们的样子就十分难看。我八岁的时候在卢森堡公园玩耍，就有这样的一个人走来坐在一个小亭子里面，亭子背靠着沿奥古斯特-公德路的铁栅。他并不说话，可是不时把一条腿伸出来，用

一种可怕的神气注视着自己的脚。这只脚穿着一只半统靴，另一只脚穿着一只拖鞋。园丁告诉我的叔父说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学监，他被辞退了，因为他穿着院士制服到班级里宣读学期考试分数。我们看见他十分害怕，因为我们觉得他是孤独的。有一天，他向罗伯尔微笑而且远远地向罗伯尔伸出臂膀，罗伯尔差点儿昏了过去。我们害怕的不是这个家伙的可怜的神气，也不是他的脖子上有一块瘤肿摩擦着他的假领的边沿，而是我们觉得他的脑子里有螃蟹或者龙虾般的思想。一个人居然能够根据小亭子，根据我们滚动的铁环，根据矮树丛等事物形成龙虾般的思想，这是叫我们害怕的。

难道等待着我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我第一次由于孤独而感到苦恼。我想在为时未晚以前，在我还未使小孩们怕我以前，找一个人来谈谈我的遭遇。我希望安妮在这里。

这真奇怪：我已经写满了十页，却还没有说出真话——最低限度没有把全部真话说出来。我在日期下面写上“今日无事可记”的时候，我是昧着良心写的。实际上，有一件小事情，一件既不可耻又非异常的小事情，不肯让我写出来。“今日无事可记”！我真佩服一个人能够头头是道地说谎。当然，下面的一件事如果不算作什么事，也是可以的：今天早上，八时一刻，我从春天旅馆出来要到图书馆去的时候，我很想捡起地上的一张废纸，可是我没有能够做到。这就是整个事实，甚至说不上是一件事。可是，说实话，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想我再也不是自由的了。在图书馆里我曾经竭力摆脱这个念头，可是我没有达到目的。我想到马布里咖啡馆里逃避它，我希望灯光能够使它消失。可是它继续留在我的身上，象一个沉重而痛苦的负担。就是它使我写下了前面的几页日记。

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大概是由于自尊心的关系，此外，也有点由于笨拙。我没有把自己的遭遇重温一下的习惯，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想不起事情怎样前后连贯，我也分不清什么是重要的。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我把我在马布里咖啡馆写的日记重看一遍，我感到羞耻；我不想有秘密，也不想有心事，更不想有说出口的事；我既不是处女也不是教士，我不必把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

我要说的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没有能够捡起一张废纸，如此而已。

我很喜欢捡起栗子、破布，尤其是废纸。我觉得最愉快的就是把它们捡起，握在我的手里；甚至差点儿我就会把它们放进我的嘴里，象孩子们所做的那样。有时我拿着纸张的一角，把大概沾上了粪污的华贵的厚纸掀起来，安妮就气愤得要命。在夏天，或者在初秋时分，在公园里有许多被阳光晒焦了的破报纸，干燥而脆薄得象枯叶一样，黄得使人以为是被苦酸浸过的。另一些纸张在冬天被踏烂、粉碎、弄污，回到土地里去了。还有一些纸张是全新的，甚至是光滑的，全白，跳动着，象天鹅似的停在那里，可是泥土已经粘着它们的下面了。它们绞扭着，挣扎着，从泥泞里脱身出来，可是又在不远的地面上落下去，再也挣扎不起来了。所有这些纸张都是值得捡起的。有时我只是轻轻地抚摸它们，凑得很近地望着它们；有时我把它们撕碎，倾听它们的悠长的破裂声；如果它们很湿，我就用火烧它们，——这倒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然后，我在墙上或者树干上揩干净我的沾满泥泞的手掌。

今天，我注视着—双灰褐色的皮靴，它穿在一个刚从兵营里走出来的骑兵军官的脚上，我的视线跟着皮靴，看见一个水潭旁边躺着一张纸。我以为这个军官一定会用脚跟把那张纸踏